

街面忆往

蓬莱有条老街叫牌坊里

张世峰

谨以此文,向在那个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,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和愉悦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致敬!
——题记

蓬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这也反映在街道的命名上。蓬莱城大街小巷的名称,或读起来高雅疏朗,或由来有典有典。现在的戚继光故里在1992年改造前,两个戚氏牌坊之间的长街旧称“牌坊

一生低调的文艺尖兵

道北中偏东有一条宽2.5米、深近40米狭仄的无名死胡同,在这条弄堂的尽头住着两户人家——街门坐西朝东的是栾家,冲着弄口坐北朝南的是王家。

栾家的主人叫栾枫,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邻家大叔。我与其长孙栾建军是发小,孩提时经常去栾家玩耍。他家的院子栽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,盛夏时节,夜来香绽放时,花香四溢,左邻右舍都能闻到,为闷热的夏夜增添不少凉意。那时栾枫正值盛年,饭后茶余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卧室里的书桌前读

书看报、笔耕不辍。他的夫人、人称栾家二婶则盘腿坐在炕头上做着针线活,夫唱妇随,其乐融融。

据我的父亲张绍平讲,栾枫老人是牌坊里老街上级别最高的干部。抗美援朝结束后,他所在的解放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下放到蓬莱,与蓬莱民间剧社合编,成立蓬莱建国京剧团(蓬莱京剧团前身),他担任指导员(后任党委书记)。他还是个大才子,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与唐聚庆联手编剧《戚继光》并搬上京剧舞台,后来还创作了《老把式》《王长福》等现代戏,热情讴歌新中国社

会主义建设的精神风貌。他参与编写的《海岛女民兵》剧本,1972年被上影拍成电影《海霞》后,风靡一时。

2011年,我翻阅新编的《烟台京剧年鉴》时,无意中看到栾枫老人的简历,原来,早在新中国成立前,他就是胶东军区京剧团的党委书记。这位在党的关怀下、在战争硝烟洗礼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尖兵,一生如此低调,不事张扬。流芳未及歇,遗挂犹在壁。那一刻,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像过老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,画面虽已模糊,但他的美德我铭刻心底。

“学贯中西”姐妹花

推开王家的街门,迎面是一株含笑,像硕大的藤条攀附在照壁旁,正屋前的空地中央盘踞着牡丹、芍药各一大簇。每逢春天,含笑开花貌美如花,花王花相争芳菲,把王家平淡的生活烘托得生机盎然。

王家的主人叫王受恒,其母张可宗是我父亲的三姑母,因这层亲缘,我叫他叔叔,称其母三姑婆。每年牡丹花开时,三姑婆都会送几枝给我祖母。我这位叔叔为人平和坦诚,一辈子与世无争,随遇而安。不过三姑婆却是书香门第

的大家闺秀,其父是花市弄张家后裔张锡庚(又名张梦李,诗仙李白的拥趸,我曾祖父的四弟),清末秀才,自办私塾杏坛育人,后又倾尽家财与人合伙办了七所私立学校。他自己管控的一所叫振华小学,清末至民国时期在登州府和蓬莱县衙当差的许多文官都是他的学生。三姑婆因“诗书传家”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,及笄之年还在基督教会的唱诗班学过声乐和管风琴,是那个年代少有的“学贯中西”的女才子。

她的小妹妹叫张可英,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新生代公办教师中数一数二的大美女,且才貌双全。我记事时她在王家的厢房里住,是南王区教学点的教导主任。我父与其年纪相仿,也在南王区教学,但论辈分论级别,都应是小姑娘管着大侄儿,我父也只好人前喊领导、人后称长辈。她唱歌低沉沙哑、有磁性,用现在的话语形容叫烟嗓腔,唱京剧演老生更是惟妙惟肖。如果她活在当下,一定是个网红主播。

梨园精英藏深巷

牌坊里道南中偏西也有一条死胡同,宽4米左右,长近30米,武霖村人称其为“杀人弄”。关于这个名头的溯源,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:话说明嘉靖末年,奉旨敕建戚氏“父子总督”“母子节孝”牌坊时,因当时工匠们第一次接手这么大型的石质结构建筑,不得要领,巨石立起倒,倒了再立,长时间工程没有进展,几波主事人都被以“抗旨不遵”的罪名法办,据说他们就是在这条弄里丢了吃饭的家当。直到后来有人想出垒土固基的施工工艺,这种血腥的场面方才终结。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证,但“杀人弄”的传说却成了蓬莱人四百多年的谈资。

弄名的不吉并未惠及这里面人家的烟火寻常,他们以“人生莫问来处”的淡定和自信,把俭朴、精致、干净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、风生水起。

胡同临街住着两户人家——蓬莱建国京剧团行政团长韩话、一号尖子演员张枫秋。两家共用一个院,显得比较拘谨,都走一个坐东朝西的街门。

韩话也是原解放军第九兵团政

治部京剧团的领导(团长),他比较庄重严肃,言谈话语不多,但坐下来谈论工作和京剧,滔滔不绝、有板有眼,讲话很有气场。他和栾枫领导的蓬莱京剧团1958年被列入全国戏曲100例红旗单位。善因结良缘,后来韩话的小儿子韩建亮娶了栾枫小女儿栾淑莉为妻,两家成为儿女亲家。

张枫秋是青岛人,上世纪50年代初到蓬莱开始演艺生涯,他演荀派旦角,到画河西岸观音嘴旁的那口井挑水时,双脚迈着的也是舞台上踩的小碎步。1961年田汉两次来蓬莱考察工作,先后观看他主演的《白蛇传》和《追鱼》,对地方剧团能有如此优秀的梨园精英惊叹不已,并十分赞赏蓬莱京剧团集体创作的力量。1962年夏,张枫秋排演《霍小玉》时,曾得到荀派创始人荀慧生不厌其烦地精心指导,并把看这出戏的全过程详细记录在其《艺事日记》中。工作之余,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切磋技艺、研究工作。受其熏陶,周围许多老百姓都喜欢上了京剧,就连村理发铺的老头,也能一边剃着头一边哼着京剧

小调、讲着诙谐段子,让在一旁等的街坊们不至于感到枯燥寂寥。我祖母看惯了行走在这些各色人等,曾经感慨道:“有文化的人个个彬彬有礼,与没有读过书的人相比,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。”文化软实力的赋形,使牌坊里成为那时蓬莱城最具文艺范儿的地方。“文革”期间,他们受到冲击,被当做“牛鬼蛇神”批斗、隔离,张枫秋甚至还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一年之久。那时,我刚从东关村的保姆家搬回牌坊里住不久,黎明时分总能听到张枫秋先生练嗓子的声音,那曲调哀婉低回,分明是对自己命运不公的控诉。1982年蓬莱京剧团解散后,他们对京剧痴心不渝,奔波城乡各地为乡邑演戏,培育京剧艺术民间新苗,乐此不疲。人生的大起大落,也在快乐的奉献中成为过眼云烟。

时光荏苒,人潮熙攘,牌坊里老街的旧貌早已荡然无存,老街坊们也散落四处,甚或作古。人去物非,但情不可终。对于热爱真诚生活的人们而言,拂去岁月的封尘,看到的依然是鲜花和太阳。

往事如昨

“上电”追忆

初福根

现在的人们赶上了好时代,生活水平步步高升,智能电器随处可见,我亲历社会的飞速发展,回想当初刚刚“上电”的情景,历历在目。

1969年,我们初家公社(今莱山区初家街道)属牟平县(今牟平区)管辖,北至金沟寨,南至南港,东至孔家滩,西至界牌村,下辖四十八个村。7月,县委下通知要村村通电,造福百姓。公社领导们积极响应,“上电”一期工程是从黄家疃一直到初家修配厂将近十公里路的距离,拉一条主线路,安排路线周边的十几个村庄分派人手,即日组成二十多人的上电施工小队。

首先是勘察定位。手提着又长又笨的测量绳、标杆,行走在田间地头,每隔一百米打一根木桩,定位挖坑,准备树立电线杆。那时没有任何智能仪器,从莱山公社到初家公社十几里线路,电线杆定位全靠目测,挖坑也全靠人工,需要挖近百个一米见方的深坑。那年夏天,雨水特别多,经常挖了不到一米,就有不少积水了,人们只能双脚泡在泥水里挖,时间一长腿脚胀得生疼。

接下来是运送电线杆。每根电线杆高十到十二米,死沉死沉的,卸车并且搬运到一个个坑点是个大难题。我们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抬起一根,每天抬着穿过一片片农田,路过玉米地、高粱地、地瓜地、花生地等,顶着八九月间三十五六度的高温和日晒,挥汗如雨,还要无数次地跨进水沟、泥泞、沼泽地。最恐怖的是,有一次爬出水沟时,大家都觉得腿痒,翻起裤腿一看,好几条水蛭紧紧贴在腿上,用手一摸全是血,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瘆人。

下一步就是立电线杆了。那时没有吊车,大家发挥聪明才智,用三根粗粗长长的绳子、四副叉杆,加上二十几个人喊着号子合力拉起,将电线杆一根根竖了起来。

那时候物资匮乏,电线杆上的铁件比如抱箍、穿钉、横担、拉杆等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初加工,用了大量扁铁、三角铁、铁棍等,一点点计算、截取、打磨成半成品,再用地板车几个人拉着送到芝罘区西南河的锁厂,镀锌防锈后再拉回来组装。各种铁件备齐后,就学习上杆、装横担、打拉线(扳线)。

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,终于开始拉线了。又赶上了寒冬腊月,气温常常在零下十二三度,但是时间紧、任务重,一期工程的首要目标是春节前要给初家修配厂通上电,所以不管刮风下雪,大家都坚持天天出工。天气太冷,大家踩着笨重的脚蹬爬水泥杆,下来时手脚都冻僵了,动不了了,需要几个人爬上杆帮忙扶下来。我们每天中午自带午饭,吃饭时,饭冻得硬邦邦、冰冰凉,根本咬不动,只能揣在怀里暖化了再吃,吃得浑身直打哆嗦。后来领导们看大家太辛苦,就联系南港村委,借用饲养院的锅,上午先把猪食熬好,中午再热我们带的午饭,并且给我们申请了补助,每人每天五分钱和一两粮食。

在大家的齐心协力艰苦努力下,1970年春节前,终于给初家修配厂送上了电。

过了春节,紧接着安排上了二期工程,各村庄开始通电。有了电,初家陆续上了十多个工厂搞副业,有面粉厂、粉坊、木材厂、麦芽厂等企业,用电量逐年增加。到2000年左右,每月的电费就达到了一百万元以上,百姓们当了工人,手里有了余钱,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。

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,当时的壮小伙子们如今已经是耄耋老人,当年一起奋斗的伙伴们已有多人作古,再难聚首。回首往事,桩桩件件,诸多感慨,我们何其有幸,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、建设者,见证了伟大的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!